

## 建國大業的光與影

泉谷陽子，《中国建国初期の政治と経済：大衆運動と社会主義体制》  
東京：お茶の水書房，2007。257頁。

蕭明禮\*

### 一、緒論與內容簡介

在風起雲湧的近代中國歷史裡，有許多年代被後世史家目為關鍵的年代。其中，1949年兩岸分治的變局，當然是最為驚天動地的大事。不過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在中國近代史中所代表的意義到底為何？建政之後的共產黨政權，是以怎樣的方式牢固地控制那些對共黨陌生、且激烈抗拒的群眾與團體？尤其1950年韓戰爆發後，中共復面臨必須與美國為首的聯合國部隊交戰的處境，要如何一面整頓百廢待舉的國內經濟與社會，又要與世界超強進行持久戰？而1949到1952年間，共黨發起了一連串的群眾運動，這些群眾運動發生的背景、經過，以及對後來中國的影響又是什麼？迄今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已屆一甲子，在建國六十週年盛大慶典光耀的背後，許多問題仍隱沒在陰影之中，未能重見天日。

近年來，隨著中國大陸檔案開放，學者開始逐步嘗試去解析上述問題的答案。其中，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的相關研究，除了歐美學界之外，日

---

\* 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本的中國近代史學界之動向亦頗值得關注。原本日本學界繼小島朋之 1985 年的《中国政治と大衆路線——大衆運動と毛沢東、中央および地方の政治動態》一書出版後，近二十年的時間內沒有中共建政初期發展的學術專著刊行；但二十一世紀以降，隨著新銳研究者輩出而有了新的轉變，其中又以 2007 年出版的《中国建国初期の政治と経済：大衆運動と社会主義体制》一書最受人矚目。自該書出版後，短短一年多的時間，日本學界即有多篇書評陸續發表，<sup>1</sup>可見該書在日本學界受重視的程度。相較之下，迄 2009 年底為止，兩岸三地中文學界仍未見到有關該書的書評介紹。故筆者願拋磚引玉，以此篇書評分享讀者。

本書作者泉谷陽子現任日本中央大學經濟學部，以及早稻田大學政經學部非常勤講師（兼任講師），該書為她東京都立大學博士論文改編出版而成。其內容共分爲序章、第一至五章正文、終章、參考文獻，以及補論五大部份。

首先在序章〈問題意識的提起與研究回顧（問題提起と先行研究）〉中，作者開宗明義指出：就是要探究 1949-1952 年這一個在中國大陸被稱爲「國民經濟恢復時期」的階段內，中國政治、經濟與社會的變動，以及各種群眾運動的展開與影響。

第一章〈概觀〉是由整體冷戰架構的角度，論述 1949 至 1952 年間中國群眾政治運動的展開，和國內外政治、軍事之間的關連性。在該章中指出，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主要問題是面對國共內戰晚期通貨膨脹與經濟崩潰的延續，因此立國的首要目標爲如何維持財政穩定，以及汲取民間資源來維繫自身的運作。但 1950 年韓戰爆發後，卻使得中共大幅度轉變其政治、經濟政策。故 1950 年 10 月發起的鎮壓反革命運動（簡稱「鎮反」運動），以及「三反」、「五反」等政治運動，其實與戰時體制下需要維持政權穩定有密切的關係。

---

<sup>1</sup> 松村史穗，〈書評：泉谷陽子著，御茶の水書房，《中国建国初期の政治と経済——大衆運動と社会主義体制——》〉，《中国研究月報》，卷 62 號 6（2008 年 6 月），頁 40-44；加島潤，〈泉谷陽子著，《中国建国初期の政治と経済——大衆運動と社会主義体制——》〉，《歴史評論》，期 701（2008 年 9 月），頁 102-106；金野純，〈書評：泉谷陽子，《中国建国初期の政治と経済——大衆運動と社会主義体制——》〉，《歴史学研究》，期 847（2008 年 11 月），頁 69-71。

第二章〈金融業的重編（金融業の再編）〉，則是以金融業為例，分析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初期，如何利用韓戰的機會，藉由政治運動強化國家對金融企業的控制。1949年後，共黨雖然以一連串財政管理的手段，一度控制惡性通貨膨脹，並大致達成對公部門資金的全面控制，但由於民間銀行、錢莊與私營工商業間的金融往來仍舊較國營行庫密切，於是中共從1951年至1952年間藉由「鎮反」、「三反」、「五反」等群眾運動，整肅民營行庫，安插共黨幹部進入管理階層，更迫使民營行庫在1952年底接受公私合營，使得國家機器有效達成對金融業的控制。

第三章〈棉紡織業的重編（綿紡織業の再編）〉，則是以近代中國工業中最重要的棉紡織業為例，分析工業部門在中共建政初期如何被國家逐步整編。原本在1950年底之前，中共仍允許私營棉紡織業維持一定程度的自主性，但1951年元月開始執行所謂的棉紗統一收購（簡稱「統購」）政策後，棉製品的流通為共黨所掌握，使得民營紡織廠在經營困難下，為求生存而無可奈何地採取偷工減料、虛報價格等被稱為「五毒」的不法行為。為此，中共以群眾運動方式，肅清各工廠內部所謂的「反革命分子」。「三反」、「五反」運動的結果，使中共對民間企業的控制更為強化，從而為1954年後加速公私合營化政策掃除了障礙。

第四章〈工會政策的轉變（労働組合政策の轉換）〉，是以工會政策的變化為主題，探討中共建政初期在戰時動員需求下對於人力資源的掌握。早在建政前的1949年7月，共黨就積極在上海等大都市中發展工會組織，但此時共黨對基層勞工的控制並不穩固，所標榜的勞資協商路線亦不成功。直到1951年2月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中引起的李立三批判事件之後，共黨對工會的控制程度才進一步強化。從1951年夏季起，工會開始發起各種政治學習運動，而中共又藉由工會改選，配合「鎮反」運動排除共黨所忌人物，從而達成徹底控制工會之目標。

第五章〈大眾運動的連鎖（大衆運動の連鎖）〉，則是探究中共建政初期

政治運動的轉化過程。作者認為剿匪是針對在鄉村活動的反共武裝勢力進行武力清掃，而「鎮反」運動則是針對都會區各機關、企業內進行清洗。當鎮反行動擴大後，整肅的對象開始轉向社會中層（軍政機關）、內層（共黨內部）。至於企業部門，中共也以「民主改革」之名進行整肅工作。而如何運用藉由「抗美援朝」等運動所大量收奪的民間資金問題，又與前述「鎮反」運動合流，成為引發整風與其他政治運動的根本因素。

終章〈建國初期的再檢討（建国初期の再検討）〉的總結中，作者認為1949至1952年其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藉由參與韓戰為契機，對於中國原有的社會經濟結構重新整編的時期，而這種戰時背景下，以防備美國為優先的社會主義體制，簡而言之就是「後進國的總體戰型態」。在此，作者也回應了序章中所提出的足立啓二對於共產中國如何進行強力人身支配的疑問。她認為其關鍵就在於1950年代前半中共利用各種群眾運動，將分散的社會結構加以組織化，並改造完成新的階級社會。

## 二、研究觀點的特色

《中国建国初期の政治と経済：大衆運動と社会主義体制》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政治、經濟政策路線轉變的根本因素，進行了頗為深刻的分析，使我們得以更深入地考察1950年代初期的中國歷史。以下將針對該書特色加以評述：

### 1. 史料運用的開創

本書除利用已出版的中國官方史料集，諸如《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一九四九——一九五二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之外，更引用上海檔案館等機構度藏的原始檔案資料，以論證中國建國初期政治運動對於國家控制經濟與社會的重大影響。這些史料為以往日本學界研究1950年代中國大陸政治運動史所未能廣泛運用，但透過作者的爬梳，

重現了由「鎮反」至「三反」、「五反」運動期間，共黨如何利用群眾運動，逐步達成黨國體制對私人企業的控制過程與手法，頗能突破前人研究所不能及之處。

## 2. 釐清中國建國初期政治運動的本質性因素

作者緊扣韓戰爆發對於中國國家戰略的衝擊與轉變這一關鍵主軸，指出此後中國的政治、經濟與社會政策，皆為配合朝鮮戰場的軍事需求而擬定的總體戰式動員。理清此一脈絡之後，再分別以金融業、棉紡業、工會三個領域為綱，把握住資金、物資、人力三大要素，並以韓戰爆發前後、「鎮反」運動、「三反」、「五反」運動的分期方式，探討中國政府如何達到極權控制的結果。藉由作者組織緊密的論述，理出中共建政初期政治、經濟乃至社會結構轉變的頭緒，將一甲子前中國巨變的經過，以完整而清晰的形象呈現在讀者面前。

## 3. 為中國社會結構變化的型態提出解釋

由作者在文末對於自身核心關懷的闡述中，我們也可以瞭解到，該書其實也是解答足立啓二等日本學者對於傳統中國社會如何過渡到現代社會的提問。一如陳耀煌對足立氏理論的介紹中所稱，<sup>2</sup>足立認為前近代的中國政權缺乏對人民經濟活動直接控制的能力，阻礙了金融與流通機構的發展，以致中國資本主義化未能進一步開展。因此足立認為從晚清自強運動以來，歷經國民政府的統制政策，國家對市場與產業的介入具有正面的意義。而泉谷陽子在本書中，透過 1949 年後中共以群眾運動改造中國社會基層的過程，相當程度為足立啓二的理論提出了補充性的解釋，亦讓我們對中國社會的根本結構有了另一層面的認知。

## 4. 日本中國現代史研究的銜接與對話

正如作者所言，《中国建国初期の政治と經濟》一書彌補了小島朋之以

---

<sup>2</sup> 陳耀煌，〈日本中國史研究會論近代中國的轉變——以足立啓二《專制國家史論》一書為中心的探討〉，《新史學》，卷 14 期 3（2003 年 9 月），頁 123-145。

降的研究空白，特別是補足了小島的研究中，對 1950 年代早期群眾運動在都會發展著墨不多的缺憾。此外，由於長期以來日本的中國研究社群中，歷史學者關注於民國時期的歷史研究，而政治、經濟學者則聚焦於中國 1980 年代改革開放時期的發展。透過該書的出版，可上承民國史、下接改革開放時期，使得中國現代研究的領域環環相扣。

### 三、內容的商榷

《中国建国初期の政治と經濟》對解析 1950 年代初中國發展情形有相當的貢獻，但本書仍有一些值得商榷之處，茲舉要點如下：

#### 1. 自力更生抑或仰賴外援？

在本書中，對於中國政府處理 1949 年建國初期經濟危機的政策與手段，有相當深刻的分析，並認為這些政策確實發揮了穩定經濟的作用。但我們所質疑的是，中共單憑社會控制或群眾運動手段，就能從經過中日戰爭與國共內戰後民生凋弊、財力匱乏的民間榨取足夠的資本？事實上加島的書評中即指出，1950 年 2 月《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簽訂後，中國就從蘇聯獲得各種形式的貸款及援助。<sup>3</sup>此外，中國學者沈志華藉由俄國檔案的統計，也進一步證明了 1950 至 1955 年間，蘇聯對中國的實物與技術援助，亦對其經濟重建發揮了相當重要的貢獻。<sup>4</sup>因此，本書似乎也應該思考來自蘇聯共產集團援助的影響，以及在冷戰架構下，身為共產世界一員的紅色中國，其政經決策的形成和其他共黨國家相互牽動的關連性。

#### 2. 政治運動的效果與界限何在？

本書的另一個問題，則是受限於探討的時代聚焦於 1949-1952 年間，以致

<sup>3</sup> 加島潤，〈泉谷陽子著，《中国建国初期の政治と經濟——大衆運動と社会主義体制——》〉，《歷史評論》，期 701，頁 102。

<sup>4</sup> 沈志華，《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3），頁 398、414-421。



無法呈現中共建政初期群眾運動的效果及連續性。實際上，文中所提及的各項政策在 1953 年之後影響仍相當明顯，類似的指謫在松村史穗 2008 年的書評中亦可見到。<sup>5</sup>同樣地，該書也未更深入探討 1949 年之前中共群眾運動經驗在建政後所發揮的作用。如果我們重新審視美籍學者塞爾頓(Mark Selden)與台灣學者陳永發針對所謂「延安模式」(The Yenan Way)的討論，可知雙方皆不約而同地指出延安整風的經驗塑造了中共群眾運動路線的特殊性與延續性。<sup>6</sup>此外，本書對於群眾運動的界限何在，亦未能進一步探究。如果以任教於英國倫敦大學(University of London)的 Julia Strauss 在 2006 年所指出的：1956 年後中共的群眾運動引發一連串動盪悲劇，是因缺乏明確形象的新敵人可凝聚群眾向心力。亦即，中國 1950-1970 年代的動亂因子，是根植於中共內戰時期及建政初期的意識形態與政治策略上。<sup>7</sup>這理論相當程度地為本書未能對於中共建政之初群眾運動的後續影響，以及群眾運動所能達到的極限提供了有力的解答。

### 3. 與國際研究對話不足

倘若我們將該書內容和近年西方及中文學界相關最新研究成果加以對照，則本書仍有頗多未能關注到中文或西方學界動向之處。例如本書第二章金融業的整編部份，其實張徐樂 2006 年的研究，即已論及中共建國初期金融業公私合營的問題。<sup>8</sup>而第五章論述「鎮反」運動期間，中國利用大規模群眾會議激起民眾仇恨的心理以達成整肅目的之描述(pp. 154-159)，就與 Strauss 2007 年分析「鎮反」運動時所列舉的案例有著極為驚人的相似性。<sup>9</sup>尤有甚者，《中

<sup>5</sup> 松村史穗，〈書評：泉谷陽子著，御茶の水書房，《中国建国初期の政治と經濟——大衆運動と社会主義体制——》〉，《中国研究月報》，卷 62 號 6，頁 43。

<sup>6</sup> 陳永發，《延安的陰影》（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頁 1-2、315；Mark Selden, *China in Revolution: The Yenan Way Revisited* (Armonk: M. E. Sharpe, 1995), pp. 242-252.

<sup>7</sup> Julia Strauss, "Morality, Coercion and State Building by Campaign in the Early PRC: Regime Consolidation and After, 1949-1956," *The China Quarterly* 188 (December 2006), pp. 891-912. 該文另收入 Julia Strauss, ed., *The History of the PRC (1949-1976)*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37-57. 在此依 2007 版。

<sup>8</sup> 張徐樂，《上海私營金融業研究(1949-1952)》（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

<sup>9</sup> Julia Strauss, ed., *The History of the PRC (1949-1976)*, pp. 52-53.

《中国建国初期の政治と經濟》所處理的問題，其實在陳永發的《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中亦有重疊之處，可惜泉谷氏並未進一步參考其成果，並提出更具開創性的觀點或看法。因此，如果該書作者能以其所利用的新史料為出發點，與各國研究者進行對話，對於釐清許多重大史事應會有更具突破性的成果。

#### 四、結 語

經過以上的介紹，我們可以瞭解 1949-1952 年間是近代中國政治、經濟、社會變化最為劇烈的時期。為了鞏固新生的共和國政權，中華人民共和國利用群眾運動的方式，將前近代、個人性、異質性的傳統社會，鑄鑄為近代、集體性、均質性的共產社會。但這並非溫和而寧靜的轉變，而是極端暴力與痛苦，以千萬中國人命為代價的結果。而且犧牲並沒有隨著過渡時期的結束而終止，隨後一連串以群眾路線為主的政治運動，帶來的只有更大的災難。這段時間錯綜複雜的謎團，在日本學者鏗而不捨的探索之下，終於勾勒出了概略的輪廓與相貌。藉由閱讀《中国建国初期の政治と經濟》，我們可以從許多如今已淹沒在歷史汪洋的訊息中，初步瞭解中共建政初期短短三年中，到底是哪些事情改變了中國的型態，以及哪些轉變種下了日後大躍進、文化大革命期間毀滅的種子。因此，《中国建国初期の政治と經濟》對於中國建國初期研究的貢獻仍是不可忽視的。最後，筆者亦想針對泉谷女士所關注的中國社會變化問題，提出一點個人的見解：的確，在中國現代化的過程中，國家對於社會與個人的支配是越來越深入而緊密，但這並不意味著只有一條道路可以遵循，事實上中國現代化的路徑絕對不只一種模式，可能有兩條、甚至更多條的道路可以帶領我們穿越曲折的歷史迷霧，走向豁然開朗的遠方。